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朱道南 于炳坤



1251/18

要 點 容 內

由革命軍推翻舊社會大變遷本一
 主學革命今八平四二一八品
 其平八二一八一據，該社會革命
 勢，由武裝同志同將波平劫
 府公眾大工，是風的食
 卡與望望時難革命將高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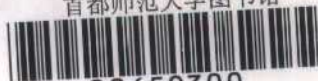
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朱道南 口述

于炳坤 整理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659300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659300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朱道南 口述

于炳坤 整理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8 字数 156,000

1977年11月新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

(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)

统一书号: 10171·790 定价: 0.61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大革命时期革命斗争的回忆录。作品从一九二四年几个青年学生离开家乡走向革命写起，到一九二八年红四师到达海陆丰与彭湃同志会师为止，表现了在大革命的风暴里，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意志。

作品以朴素生动的语言，描绘了一群青年学生献身革命的光辉形象，记述了他们在革命的洪流中英勇奋斗的动人事迹。

目 录

走向革命.....	1
湘江逆流——马日事变追记.....	37
从武昌到广州.....	85
广州起义.....	124
红四师奔向海陆丰.....	172
后记.....	230

DDP/23

走向革命

一九二四年，祖国的锦绣河山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着，他们在各帝国主义的利用和驱使下，年年混战，兵连祸结，弄得中国乌烟瘴气，暗无天日。这时，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帮助下，改组了国民党，在广东成立了革命政府，制订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。但是，我们这些呆在穷乡僻壤的年轻人，耳目闭塞，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好消息，看不见南方的一线光明，所能听到和看到的，却是周围的一片黑暗，以及劳苦大众窒息得连气也透不过来的呼声。

我生长在鲁南峄县的一个农村里，这里，被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着。穷山恶水的地理环境，加上军阀战争的浩劫，苛吏的勒索，地主的剥削，土匪的横行，使人民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人们劳累终年，不但得不到温饱，而且常常是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，有时还弄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

那时我在镇上的一所学校里读书，是个青年学生，面对着这样的现实，终日愁眉苦脸，走投无路，但又不懂得要参加革命，心头郁闷的时候，常常和三五个要好的同学，畅谈一番，以

泄胸中的不平。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想学那梁山上的好汉，到抱犊崮山上去树起大旗，除暴济贫，替天行道。当然，这种想法是办不到的，因此我们都为找不到出路而心中非常苦闷。

在学校里，我有两个非常要好的穷同学，一个叫谢拙民，他聪明而稳重，很有抱负，十分讲义气，体格异常健壮，有“铁膀子”之称，是佃农出身，家中只有兄嫂两人；另一个叫杨荣林，是校中数一数二的高材生，身材矮小，人很灵敏，个性爽直而高傲，遇事常有独特的见解，他父亲是个深受当地农民爱戴的贫苦知识分子，不幸在前年去世了，从此杨荣林一直寄居在叔父家里。我们三人，形影不离，十分投机。

期末考试后，有一天，放学回家。我们三人翻山越岭，边走边谈，正谈得起劲的时候，忽然见我年老的母亲，哭哭啼啼、急急匆匆地从对面路上走来。我大吃一惊，心想一定出了什么事情，立刻迎上前去。母亲哭诉了一阵，我才明白了原因：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很好的校长，并请来了几个好教员，他们对待认真读书的学生，尤其是穷学生，很关心爱护，功课也抓得紧，深受大家的欢迎，但是却惹起了那些富家子弟的嫉恨。有个大地主的儿子叫黄锡汤，又名黄僖棠^①，在家排行第五，所以平时大家都叫他黄五。此人无恶不作，吃喝嫖赌样样都来。他仗着父亲的势力，老和校长作对，因为他父亲和官府、土匪都有勾结，谁也不敢惹他，校长和老师们都只好忍气吞声。我们却看不过去，年轻人火气旺，也不去考虑会出什么乱子，有一

^① 此人后来混进黄埔军校第五期，但没毕业就跑回济南，又去日本。一九三二年，他是特务组织山东省国民党复兴社的负责人之一，在济南正谊中学任训育员。那时，“四人帮”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在正谊中学上学，就是由黄僖棠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的。

次，我领着大家狠狠地揍了他一顿，没想到这家伙通过一些关系，暗地里唆使土匪来报仇了，土匪要我三天内送三百个“袁头”去，到期不缴钱，就要来抓人烧房子。

我们乡间土匪如毛，绑票杀人，作恶多端。两月前，我的一个堂兄，就因为被土匪敲诈，缴不出“袁头”而被杀害了。我即使将房子卖掉，也缴不出这笔钱，怎么办呢？心里又气又焦急。

杨荣林给我出了个主意：将老母送到舅父家里去住，自己离开村子，请校长帮忙提早发一张毕业文凭，到济南去读师范。他还说：

“出去见见世面，也好看看天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”

大家商量了一阵，觉得只有这条路可走。谢拙民、杨荣林也都表示愿意离开家乡，和我同到济南去闯一闯。

主意已定，我们就先送我母亲回家，随即去看校长，校长很同情我们，立刻设法填发了几张文凭。我们又将行李先集中到谢拙民家里。

第二天夜里，我慢慢打开门，见外面月秀风清，星光灿烂，便更加小心地走出门去，在村头巷尾张望了一会，见没有人，就回过身子向家里招了招手。谢拙民和杨荣林挑着东西出来了，后面跟着我母亲。我将门锁上，领着大家往我舅父家里走。

路上，母亲不断低声哭泣着向谢拙民、杨荣林说：“你大哥四岁死去了父亲，我好不容易把他带到这么大，又偏遇上这种事，真是人善受人欺，马善尽人骑，这个年景真不如死了干净。”

她一面哭着，一面叙述着孤儿寡妇的苦辛，还不断地回头

向家里张望。

谢拙民和杨荣林默不作声。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悲愤，想到这个老家不久可能化为灰烬，又想到此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到年迈孤零的母亲，就禁不住暗暗掉泪。唉，这是什么世界啊！

半夜时分，我们越过了几重山，到了我舅父家里。舅父见我们半夜上门，母子俩又是一副悲切的面容，很是吃惊，忙问我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母亲已泣不成声，我沉重地将情况告诉了舅父。舅父听了后，叹着气说：

“唉，我们惹不起人家啊，现在也只有往外跑啦。”随后，他又宽慰我，“你只管放心，你娘在这里，我如有一口饭，定分一半给她吃，我锅里有粥，决不叫她的碗里空着。你好好去念书求上进，要争这口气，总有扬眉吐气的一天。”

为了不让土匪知道我要逃走，我和谢拙民、杨荣林必须连夜动身去济南。时间紧迫，我来不及多说什么，将母亲拜托给舅父，然后又跪在母亲面前，磕了三个头向她告别。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，自小就对我爱护备至，见我要走，哭得几乎昏了过去。我悲痛地站了起来，将母亲扶起，理了理她那散乱了的白发，安慰地说：“娘，别难过，儿在乡下也是遭罪受气，反不如出去，也好长点见识。将来，我一定养你的老，送你的终。”

谢拙民和杨荣林也帮我劝了一阵，母亲收住了眼泪，要我安分守己，好好上学念书，常给她写信。

自从我们三个好朋友决定一起去济南后，我疑神疑鬼，最担心的是怕土匪钉住我，使我逃不出去。我们从我舅父家里出来，去谢拙民家取行李的半路上，隐约看到后边有个黑影老跟着我们。起先，我们还以为是赶夜路的，可是越看越不对头，

我们有意停下来看他时，这个黑影却绕过小路看不见了，等我们再往前走，他又慢慢地跟了上来。更教人不安的是：谢拙民家住在山前，这一带没有几户人家，晚上很少有人走动，我们走过山来，那黑影也跟上来了，这怎能不使人更加吃惊呢！

我拉了下谢拙民和杨荣林，就往小路岔出去，想在村边兜个圈子，把黑影甩掉再去拿行李。这办法很灵，我们兜圈子时，黑影就不再跟我們了，大家放了心。可是一个圈子兜下来再回到原路上时，见那黑影已经要到谢拙民家门口了。大家很着急，觉得这家伙一定晓得我们的行动。我连声叫糟糕，杨荣林也很吃惊，谢拙民胆大心细，他说：

“看样子这家伙早注意咱们了，还是赶上去弄掉他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”

我和杨荣林都没有这样的胆量，听了谢拙民这话后，脚也软了，但是又想不出别的好办法。谢拙民上小路去赶那黑影了，我们仗着他力气大，跟在他后面。越赶离黑影越近了，我的心也跳动得更加厉害，不由自主地落在谢拙民后面好几步。但这时我想，人家象秦叔宝一样讲义气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如果我自己退在后面，那还象话吗？于是就咬了咬牙，急步赶了上去。

谢拙民的眼力最好，他突然转过身子对我说：

“老道哥，不对啊，这家伙扛着行李呢！哪有土匪扛着行李钉梢的？”

我和杨荣林也看到这个人肩上的行李了，也感到很奇怪，但又捉摸不定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人到谢拙民家门口，吃力地把行李往地上一放，喘了两口气，就上前叫门。这时，我们与他的距离更近了，才看清楚这人原来是前庄一个地主的儿子，我们的同班同学孙之斌，并

不是土匪的监视哨。杨荣林松了口气，跺了跺脚说：“嗨嗨，真是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”

孙之斌的父亲很坏，家里养着好几十个民团团丁，是我们县里的一方之霸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极其残酷，当地的农民都叫他二知县。孙之斌本人虽然没有做过坏事，但在校时我们也不愿与他接近。他今天半夜找上门来干什么呢？真教人捉摸不透。

谢拙民的哥哥把门开了，孙之斌尚未开口，谢拙民就奔上去说：

“孙之斌，你半夜来干什么？”

谢拙民的话音很响，带有责问的味道。孙之斌不知后面有人，吓了一跳。回过头来见是我们，心定了。接着，他忽然痛哭起来，这更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了。他连哭带诉地讲了好一阵子，我们才弄清了究竟。

原来，几年前，有个农民受尽孙之斌父亲的迫害，走投无路，去当了土匪，现在已成为土匪头子。昨天夜里，这土匪头子带着大批人打开了孙家院子，抢劫一空，将孙之斌家里人打死的打死，捉走的捉走，孙之斌住在镇上学校里，才得幸免。土匪临走时放了一把火，将孙之斌家的房子烧得精光，还扬言要捉孙之斌斩草除根。孙之斌听到这消息后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他没有地方去，就去请求校长帮助，校长看他可怜，叫他来找谢拙民，和我们一道去济南投考师范，所以他连夜来了。半路上遇见我们时，他也怕碰到土匪，所以躲躲闪闪。

“这条路可不是你走的，你细皮嫩肉，享惯了福，半路上走累了没人抬你。”谢拙民听孙之斌要跟着去济南，很不高兴。

“我不怕吃苦，我走得动……”孙之斌哀求着。

我们商量了一会，觉得孙之斌和我们好比“黑碗砂壶”，不是一个窑的货，不想带他走。但是孙之斌死缠住我们不放，我们不去理他。

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要上路，谢拙民的嫂子烧了一锅面汤，拿出六个高粱煎饼，我们吃过后，杨荣林说：

“咱们今天离开家乡，以后千万不能忘了穷人！”又说，“我已父母双亡，除了还有个叔父外，你们就是我的亲人，这次出去，咱们要情同手足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

我们听了连连点头，放下碗后就捎着行李，向谢拙民的兄嫂告辞。

孙之斌还是缠住我们，一直跟在后面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发誓一定不连累我们，说就是爬也要爬到济南去。我们见他这副样子，一时又可怜起他来，终于带他去了济南。

二

在未到济南之前，我曾对谢拙民他们说：“不知大城市里是否会比咱们乡下讲理些。咱们一定要用功读书，将来如果能做出一番事业，千万不能忘了咱们离家时讲的那段话。”

谢拙民说：“我看济南也不会比乡下好多少，反正都在张宗昌脚底下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翻身抬头。将来咱们一定要为穷人多做些好事，这是决不能动摇的。”

杨荣林很激动，他说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要过好日子，必须铤而走险，把所有的军阀、地主豪绅斩光杀绝，让穷哥儿们坐第一把交椅，天下才能太平。”

每当这种场合，孙之斌老是不开口。

我们到了济南，一上大街，就被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吸引住了，最使我们这些乡下人感到新奇的，是那些穿洋装、戴眼镜的外国式的中国人。当时，我们在一家小铺子里歇脚吃饭，杨荣林用肘子推推我们，叫我们快看。顺着他努嘴暗示的方向看去，见店门前有一对男女走过，男的穿淡黄色西装，脚上穿双尖头皮鞋，油光光的头，戴副金丝边眼镜，三十来岁的年纪就拿着根手杖，看上去挺滑稽；女的穿着紧身旗袍，胸脯突得很高，鞋子后跟总有两寸厚，很长的一段光腿从旗袍衩中露了出来，手里拎了个亮晶晶的小皮包，头发髻得活象一条狮子狗，一张大嘴涂得鲜红，她紧挨着男的一步步走着，看她那走路的样子，比我们乡下小脚老太婆还困难。我们看了好笑，杨荣林凑趣说：

“据说唐明皇提倡三寸金莲，现在又不知是哪个‘唐明皇’下了圣旨，提倡踮脚尖了。”

我们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被弄得晕头转向。我说：

“咱们这些土包子是乍见为奇。”

我们正在说笑时，这对男女对面走来了一个白发老先生，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烟袋，一条灰白的细辫子拖在背后。他向这对男女膘了一眼，就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“呸”的一声叫得很响。那女的用轻蔑的眼光扫了下这位老先生。谢拙民认为这个老人一定是从乡下初来，所以也少见多怪。

谁知新奇的事多着呢，我们走出店门不久，就看到有一大群人围在马路旁边，听一个站在高地上的青年讲演。这青年穿件蓝布长衫，脸上有几颗稀稀落落的麻子，看来不过二十来岁。他在大胆地痛骂军阀张宗昌，痛骂帝国主义，还说了一些穷人到处受压迫，和共产主义、无产阶级等等这些当时我们还

听不懂的名词。我们只觉得这个人胆子大,有骨气,能在大街上骂张宗昌和帝国主义,为穷人说话,真难能可贵。不一会,有几个警察吹着警笛来捉他了。这青年向天空撒出一叠传单,迅速钻进了人群。杨荣林偷偷地接了张传单,到了静僻处,拿出来一看,上面写的是:打倒万恶的军阀张宗昌,坚决反对帝国主义,工农商学兵携起手来,拥护CP、CY①。

我们不懂什么叫 CP、CY(连这几个字母也不识),根据全文的意思猜测,估计这是为穷人讲话的“抗暴”组织。在这暗无天日的世界里,竟有这样“见义勇为”的好人,真使我们高兴极了,大家都庆幸来济南这条路没有走错。杨荣林特别钦佩那位撒传单的青年人,他说:

“如果能和那青年在一起,即使抛了头颅,我也甘心!”

从此,我们就用心打听反对军阀、反对帝国主义的“抗暴”组织在哪里。

后来,我们考进了山东第一师范学校。有一天,杨荣林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我们,说 he 已找到了“抗暴”组织,认识了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叫殷君采,是国民党员,愿意介绍我们参加国民党,叫我们快去跟他认识认识。我们很高兴地跟着杨荣林去了。谁知谢拙民和殷君采一见面,立刻就把我们拉了回来,他说:

“原来是这个人啊!我进学校不久,就听到好多人在议论他,别看他表面上口口声声讲革命,肚子里却是男盗女娼,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咱们可不能跟他跑。”

后来,殷君采又主动问杨荣林,要不要参加国民党?杨荣

① CP 指共产党,CY 指共青团。

林睬也没睬，掉转屁股就跑了。

当时，虽然国共合作，国民党已经过改组，内部比以前纯洁些，但还有不少渣滓混在里面，殷君采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觉得国民党连这种人都收，因此对国民党很反感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严冬到了。我们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困难，都欠了一身债，连棉裤也穿不起，头发有几寸长，也没钱去理。年终考试完毕，有钱的同学都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了，一班穷同学，则在校园里徘徊，为下学期的开学费用发愁。这时，殷君采活跃了，他介绍这个去做家庭教师，推荐那个去搞临时性的抄写工作，似乎对大家很关心。但对我们几个，却未予安排。

一天，殷君采指使一个人神气活现地走来了，对我们说：

“我知道你们没钱回家过年，还愁着下学期的开学费用。为了对大家表示同情和爱护，这两天我东奔西走，给大家找了条出路：有位汪经理，想招几个临时工，每人每天工钱二毛，你们去不去？”

虽然小知识分子比较爱面子，但在没有办法时也就顾不得了。我和谢拙民、杨荣林知道这人和殷君采关系密切，没有理睬他，但孙之斌一头插在蜂窝里，抢着要干。杨荣林追过去，一把将他拉了回来，跺着脚说：

“你就不能争口气吗？你找他……”

孙之斌焦急地抢着说：“不干下学期怎么办呢？”

说完，他又奔去了。这人回过头来朝我们冷笑了几声。我们难受极了，恨不得将不争气的孙之斌拖回来揍一顿！

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个人走到这人面前大声叫道：“慢着！”

这人抬头一看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。我们感到奇

怪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正是大街上讲演的那位青年，心里立刻高兴起来。接着这青年厉声责问殷君采指使的人说：

“你怎么做得出！在我们穷同学身上也要刮！你还有一点……”

这位青年气得面孔血红。被责问的人则羞得脖子发紫，他支吾了几声，很尴尬地溜走了。原来做小工的工资是三毛五一天呢。

经过交谈，我们才晓得这青年叫田慕翰，是第一师范附设农村师范的学生。他也是为了解决穷同学的困难，来组织大家去做临时工的。

田慕翰等我们报好后，又和大家交谈了一阵，鼓励我们不要向困难低头，对前途要充满信心。他要走时，我和谢拙民、杨荣林依依不舍，送了他好长一段路，他答应今后时常来看我们。

从此，在田慕翰的帮助下，我们几个人的思想认识在很快地提高着。

一九二五年六月，我和谢拙民第一次参加了共青团的活动。当时，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着，济南的工人、学生、商人都纷纷罢工、罢课、罢市，游行示威，连给日本人烧饭的厨师，看大门的门房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。

这时，田慕翰忙极了，到各个学校去讲演，我们去找了他好几次，都没有遇到。

六月初的一个傍晚，谢拙民又去找了田慕翰。深夜，他带着两个纸包回来，把我从床上叫起，轻声说：

“老道哥，慕翰讲CY要我们协助做件事情。”

我听到共青团要我们做事，心里又高兴又紧张，忙问：

“什么事？你快说吧！”

谢拙民说：“明天各界要在省议会门前举行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大会，有两包传单，要我们带去。”

我说：“行啊！”

谢拙民交给我一个纸包，还嘱咐说：

“慕翰讲，明天的大会参加的人很多，可能张宗昌要来镇压，叫我们小心行事，不要让荣林知道，因为他太冒失；也不要让孙之斌知道，他和我们不大一样。”

那一夜，我没好好合眼，想了很多事情，心里很激动，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是个革命者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将传单小心翼翼地用绳子缚在长衫里面的肋下，乘杨荣林他们还在打呼噜，就和谢拙民溜上街了。

这天，阴云密布，天色昏暗，好象预示着要出什么事情似的。

省议会是座高大的建筑，样子象只鸟笼。我们来到这里，门前已经集合了数千人，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，大部分是青年，其中学生最为活跃，他们慷慨激昂地在讲演。人群象潮水一样，不断往楼里涌。十几岁的孩子和五六十岁的老人也来了。有人手里还拿着小三角旗，上面写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、“抵制日货”、“为顾正红烈士报仇”等口号。看上去，这个大会的规模不小。

忽然，我们在省议会的大楼里看到了田慕翰，他很高兴地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，说自己有事，不能同我们在一起，叫我们等大会快结束时，将传单拿出来散发。随后，他就去人群里各处活动，一忽儿到讲坛那里，一忽儿又到门前纠察那里，